

寻找上海叔叔们

2002年4月27日,61岁的张以榕走进新民晚报社。他来,是因为前一天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篇《到上海去扩军》,触发了他多年的一个心愿:寻找叔叔、烈士张越龙的足迹。

1943年,张越龙从芜湖的日军苦役营与难友们暴动逃出,回到上海养伤,并留下了和时年2岁的张以榕唯一合影。伤愈后,他就回新四军去了。1950年家里收到烈属证,只知道他是1945年牺牲的。但究竟发生了什么?这成了家人无尽的牵记。

在新民晚报副刊部,张以榕得到了线索,联系上了万中原等新四军老战士。终于,数十年前的往事揭开,一段段壮烈的历史重现……张以榕写下长文《寻找叔叔》,发表于2006年5月14日的新民晚报。

这次寻找,又引出了一次大规模的“寻找”。《到上海去扩军》的作者张耀时任江南抗日救国军第二纵队(后改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)政治处主任,他的女儿张小滨、儿子张建儿2007年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章海红策划了大型系列纪实广播节目《新四军中的浦江儿女》(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和上海档案馆收藏),又广泛收集采访、口述、回忆录整理成《新四军中上海人》出版,将一大批参加抗日革命部队的上海人的风云经历,整体呈现在世人的眼前。

这些如今大多已离世的上海“叔叔”“阿姨”们,有太多的故事……

我们永远铭记这些革命先辈!
西线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,让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
浦江儿女多奇志。在纪念

碧血长流不尽

上海兵在新四军

◆ 萧岩

“到处能听到上海话”

上海,是一座被现代文明浸润的城市,是一座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城市,也是一座有着红色文化血脉的城市。强烈的民族意识,让上海人不甘于被奴役;“精忠报国”的爱国情怀,让上海人踊跃奔赴前线;广泛接触的先进革命文化,让许多上海人认识到只有跟对队伍,才能真正实现抗日的决心。

抗战开始后,上海地下党(中共江苏省委)按照党中央指示,陆续调派党员到上海及附近地区组织抗日武装;同时组织难民、进步青年和知名人士参加新四军。这就为上海人参加革命部队提供了通途。在那个年代,因为根深蒂固的观念习俗,在农村动员当兵,不太容易;但在上海,由于“一·二八”抗战、“八一三”会战等的洗礼,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意愿强烈,动员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。在江南抗日救国军(新“江抗”)1940年9月至1941年7月的自主扩军活动中,人数最多时,一天从水上运输线下来的新兵就可以编一个连。据不完全统计,从上海有组织地输送去新四军的就至少有21000人;数量巨大的分散自发前去的人数则无法计算。

后来广为传唱的沪剧《芦荡火种》、京剧《沙家浜》故事原型、沙家浜部队36个伤病员中,有许多就来自上海。曾任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连(即现在的“沙家浜连”)政治指导员的金辉,生前一直保留着一本日记,上面记录着一份珍贵的“花名册”:1942年二连全体104人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入伍年月、是否党员。根据金辉的回忆,其中从上海来的就有76人,占全连人数的73%。新“江抗”在江南活动时,上海兵的比例超过80%。青昆支队靠上海近,比例还要更大。某种程度上说,这支部队就是“上海子弟兵”部队。

由于上海来的人数众多,部队中通行上海话或者带有各地口音的上海话,即使老红军干部也基本能听懂,还会说“阿拉勿来时(不行)”等简单上海话。许多回忆文章中都记录了上海兵汇聚的盛况:

1942年底我来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担任政治处主任,发现这里的上海兵比较集中,从团政治处的股长,干事,到营长、营教导员、连长、连指导员、文化教员,直到班里的战士,到处能听到上海人讲话的口音。(彭冲)

1945年9月调到苏中军区教导旅第2团卫生队,发现这里讲上海话的人很多……这些上海人政治热情高,工作严肃认真,打仗不怕死,还有一个特点是比较活跃,聚在一起时热闹非凡。(陈耀轩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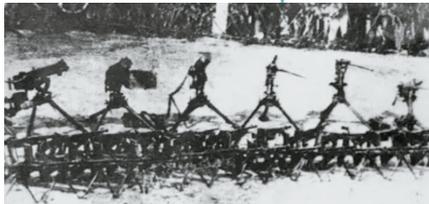
这无数从上海走上抗日前线的人中,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有在上海求学、工作、生活的人,有抗战后逃难到上海的,还包括在沪的华侨、朝鲜人等国际主义战士……上海,是一个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的地方,给所有人走上舞台的机会;新四军,则以伟岸的胸怀,给来自上海的新人提供了一个在战斗中成长的平台。



▲ 新四军的医务工作者



▲ 1939年4月新四军东进前陈毅(左)和刘炎、刘飞、叶飞、吴焜、乔信明



▲ 三珠河口伏击战,打死日军240余人,伪军600多人,缴获大量枪支弹药

脱下旗袍,穿上军装

在日寇阴影笼罩下的上海,要想去新四军,绝非那么简单。先不说一路上要经历的重重阻碍与危险,就说“迈出家门”这一步,对许多青年都是个挑战。跳窗的有之,翻铁门的有之,有说去看戏的,一走就是九年……

有着许多的“不告而别”。在上海国货公司当学徒、下班后在上海华光戏剧专科学校读书的宋丹回忆,这两处的青年、职工、学生“经常有人‘失踪’了”。当他自己也终于在1941年到了新四军,去“东路抗校”学习时,发现接待他的负责人杨维生就是国货公司同事范晔,在班上又碰到了公司同一个部门的练习生叶永信(叶源昌),后来得知华光剧专的同学王大经(李明)、张优等也来到了新四军。“失踪”的同事、同学,如今又成了战友。

也有“英雄之家”和“英雄母亲”。烈士郑大方的弟弟郑仲芳也参加了地下党。母亲曾英1941年前后动员了郑大方的远方堂叔郑观秩、堂哥郑洽、郑洪和邻居徐博、董丽娟等人参加新四军,还叫15岁的大女儿郑慈带着13岁的弟弟郑国芳也参加了新四军。1945年初又带着13岁的女儿郑中英和不满10岁的国英、雪英到达根据地。

也不乏“革命浪漫主义”。

1944年2月下旬,一个24岁的上海姑娘来到了四明山。她的未婚夫成君宜在这里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警卫大队指导员,1943年底,他用密信向在同德医学院学习的徐志远发出邀请:“战斗激烈,前方缺医少药,你是医生,盼望你来四明山,与我们并肩战斗!”可当徐志远历经艰辛,终于辗转到达,却见不到爱人的身影——原来,那位她朝思暮想的上海青年,在半个月前牺牲了!在悲痛中,徐志远继承遗志,埋首于后方医院的工作,努力革命。许多年后,她的遗愿是:请将我的骨灰埋在四明山成君宜烈士墓旁。

新四军中的上海女兵这道风景线,在那个年代是十分特别的。

1942年,上海新裕纺织厂练习生吴金凤与三个同伴一起到江苏靖江投军。接待他们的干事,出乎意料,竟是一个女新四军。“那时民间流行的谚语是‘好铁不打钉,好男不当兵’,可这抗日救国,不只我们来当兵,我们面前就是有了女兵!……当时觉得,她是我见到的最美丽的女性。”

从上海走出的女战士,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。1941年,19岁的张志衍准备到苏南茅山地区参加新四军。临走前,正是过完年,富人家小姐都换新缎子旗袍。穿这身怎么走?她就逗母亲说,现在外面这么乱,还是换上平时普通的衣服比较安全,由此得以轻装出奔。而另一位女兵鲁纳回忆:1940年她和姐姐来到盐城进入抗大五分校后,“脱掉旗袍,穿上军装,扛起步枪,每天早晨出操。”

更深层的,是思想方面的自我改造。“孤岛”沦陷后,在护国学校读书的王琪和九个同学一起来到苏中抗日根据地,穿上了新四军的灰色军装。她们每人领到当月四块银元薪水,但不久,了解到师级干部每月只有三角钱的津贴,就联合打报告,主动不要薪水。这是从思想上“脱下旗袍”;这是上海兵在军旅生活中,由不自觉地自觉的革命性进步。

在抗日战斗中,在革命中,改造自己,奉献自己。这样的故事,发生在几乎每一个上海兵身上。

信息的“花名册”
记录上海兵



军中的“文化”部队

一个常提的说法是,到部队要过三关:一是走路关。每日在乡间山路烂泥地行军数十里,与在大马路上漫步相比,是截然不同的挑战。二是生活关。紧张艰难的战斗中,不可能有城市里的生活条件。三是打仗关。就算曾在上海目睹、亲历过炮火,真的上战场又是另一回事了。但这些有文化、接受能力强的青年战士很快就适应了。他们在干部和党员带领下,如何利用地形物、如何接敌、如何相互掩护、各个跃进……几仗一打就学会了。高素质的上海兵为培养后备干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有一对孪生兄弟——裘亦明、裘继明,不满17岁就被提升为连副指导员。

上海兵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特长。金辉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:“我们这支部队由于上海兵占了极高的比例,所以整体的文化程度较高。陈军长(陈毅)在1942年检阅五十二团时曾说,我们团是新四军中的‘文化团’。……就以二连的文化程度统计来看,中学8人,小学66人,还有30人识字在300—500之间。……1942年全连党员37人,占全连人数36%,以出身统计,产业工人32人,手工业工人30人,店员学徒10人,雇工3人……工人阶级就达75人,在那个年代,以工人成分占优势的连队,在新四军八路军中是罕见的。”文化程度高,文化生活就活跃。唱歌、演戏、出墙报、写诗歌小说、漫画……连队上政治课,讲“工人与革命”“农民与革命”,还组织哲学小组,学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。这样的部队,既是战斗队,又是宣传队、工作队。

许多上海人成为从事后勤工作的骨干。这些岗位上,他们无疑可以充分发挥才干。一个小例子,有人曾回忆董维仁任第一旅第一团政治处统计干事时的一件小事:团队每月要做参谋处的兵员武器实力统计、政治处的政治质量统计、后勤处的人员给养装备统计。小董每次都要找他核对数字,他觉得统计只是例行公事,为何如此认真?董维仁严肃地说:我们的数字相差一两百人,一两个连哪,战斗里投入一两个连的兵力很可能是决定胜负的!其认真的态度让他深思。也许,这样对“数字”严谨得一丝不苟的作风,也是与充满现代数字理念的上海文化息息相关的吧?

正如谭震林当时所说:大量吸收工人、学生、城市无产阶级,会大大改变部队的成分,更好地提高部队战斗力。

再请看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: 教导员,你死了。 但你的影子,总在我脑海里转来转去。……你之所以这样在我心里,并非是我们一向很好,却是因为不断的有意见,不断的打通思想,在不同意见交流中,冲激出来的友谊,仿佛更永不磨灭。 教导员!……你征求我的意见,我率直地说:“你很聪明,有办法,但是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锋芒太露的缺点,引人反感。”我又说:“你接受意见很好,改正不够。”这是指你不大下连队而言。可是,你并不因此而难过,你是很勇敢地改正了……

这篇悼文是指导员(刘淑)写给牺牲的教导员(柳汀)的,十个月之后,他也牺牲了。这两位来自上海的战士的革命友谊,是在不同意见中“冲激”出来的;对他们来说,在革命中,在工作中,互相间的关系是平等的。也许,其中也包含着源自上海文化中的现代人际关系、讲求平等的现代精神,并与先进革命思想文化交融……

抗战岁月中,许许多多浦江儿女为了崇高的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1940年,上海烈士李珉牺牲前留下了一句壮烈遗言:“同志们,战士流血不流泪。”陈毅同志得知后写了一首诗:

革命流血不流泪,生死寻常无怨尤。
碧血长流流不尽,一言九鼎重千秋。
长江不流尽,浦江儿女多奇志。“叔叔”的事迹不是过去时,而是现在时,未来时;踏着“叔叔”的足迹前进,用他们的精神鼓舞我们,永远铭记这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!